

田学斌◎编著

中国人的 经济学

Economics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人的经济学

田学斌◎编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经济学 / 田学斌编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71-0980-8

I. ①中… II. ①田… III. ①中国—经济
IV. ①D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8204 号

责任编辑: 肖 彭 唐 伟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5

字 数 342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ISBN 978-7-5171-0980-8

中国人也有经济学

(代序)

孙中山先生 1912 年在上海演讲《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时曾说：“……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学家也。兴盐鱼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学之原理成为有系统之学说……骤视之，其理似不高明深邃，熟审之，则社会之万象莫不包罗于其中也。由此可知：（一）世界经济学乃中国人首创。（二）管仲即首创世界经济学之大经济学家。（三）经济学乃一极高深繁难、包罗万象之学术。”这一结论是孙中山遍历世界、考察研究、阅读大量世界经济学专著之后，所发之言论，所作之评断。在孙中山先生看来，管仲不仅为中国经济学创始者，亦为世界经济学之创始者。的确，从管仲的经历来看，不仅有论著，一部煌煌巨著《管子》传后，而且有实际事功，为齐国宰相，让齐国成为当时的强雄之一。这是那些只研究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家所无法相比的。更为令人钦佩的是，管仲虽是三千年前的人，但他主张的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多不易之论。正基于此，我们不能把《管子》一书只作为古籍来看，而应当古为今用，学习弘扬他的优秀思想以指导今天的经济社会实践。

其实，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管子》只是中国经济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除了《管子》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学术中还有

许多蕴涵丰富经济思想的典籍，如《墨子》就是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其中的许多经济思想和管理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例如，人们通常认为，科学管理办法是从西方引进的，其实不然，在墨学中就有科学管理的思想，那就是“尚同”。“尚同”要求一要有严密的组织建设，二要有严格的制度建设。墨家还有一条重要的经营思想，就是主张节用，反对厚葬久丧，反对繁饰礼乐，“穿褐衣，吃粗粮”，“去其无用之费”，可谓是厉行俭德的楷模，对中华民族精神有正面影响。有人做过调查，在移民国外者当中，最愿意把钱存储到银行的是中国人。并不是中国人的收入比别人多，而是他们花销比别人省。墨家崇尚俭，更崇尚勤，鼓励人们热爱劳动，明白“赖其力者生”的道理。墨家之徒不但如此主张，而且身体力行，自践躬履。据说，墨子面目黧黑，手足胼胝，摩顶放踵，像拓荒牛一样在创业路上前行。在当时，墨家的这种律己持俭的精神很得人们的赞佩。

中国历史悠久，有着古老的文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劳动、繁衍、生息中，不但体悟积累了丰富深刻的经济思想，而且创造了宏伟的经济奇迹，建立了丰硕的事功。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堪与世界最早最先进国家的成就相媲美。在商代，中国马车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马车在构造上极为相似，相对年代也很接近。在车辆的系驾方式上，我国古代人民的成就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殷商时代的系驾方式和西方古车大不相同，它不是头式系驾法，而是胸式系驾法。头式系驾法的缺点在于头带压迫马的气管，马奔愈急，则呼吸愈难，马力无法充分发挥，这是西方古车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殷商古车所采用的系驾法则不压迫马的气管，马力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性能较西方优越。而西方在公元8世纪才由头式系驾法改进成胸式系驾法，这时我国的系驾法却已向鞍套式过渡了。13世纪60年代，我国已完成了鞍套式系驾法的创制，西方则迟至14世纪才出现曾使用这种系驾法的资料。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1275年来华，在华期间对中国水运发达的情形大感惊异。他认为在长江上来往运载的贵重货物，比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河运和海运量加起来还要多。据他的估计，在长江下游航行的船只大约有15000艘，还不包括那些用上好木材制成的木筏。18世纪初期，有一位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水运能和中国相比，中国举世无双的内部贸易即完全依赖水运。他说：“在这个国家里有两个帝国，一个在水上，另一个在陆地上。”一位于1832年曾在上海停留过的外国人林赛估计，当时上海出入船的吨数已相当于或超过伦敦，可见上海已是世界大港口之一，而上海在当时的贸易量还不及广州，甚至还少于武汉和天津。难怪亚当·斯密在他的开创性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指出：“整个欧洲的大部分……陆运运输的费用使得大多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表面价格都大为增加。在中国和印度，由于内陆水运的范围广、种类多，节省了大半的人力，因此，他们大多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表面价格也就降低了许多。”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重农主义学派。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始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他提出的“平粟法”使魏国因而富强。欧洲直到18世纪才出现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东西方相差近2000年。

在中国，当信史时代一开始（商朝），已经有比谷子之类的初期货币更为进步的货币——贝币存在了。贝币使用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秦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为止。汉武帝时（公元前118年）铸造的五铢钱，由于其使用的成功，成为汉代政治兴盛的象征。有趣的是，到公元5世纪时，西域的高昌国也自铸五铢钱。可见，五铢钱因长期拥有“强势货币”的地位而成为东亚国家的标准货币。我国到宋代宋真宗时（公元998年），信用工具已十分发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交子”，也就是交易之媒介的意思。“交子”极类似现代信用工具中的可转让定期存单或银行本票。宋代还发行了另一种信用工具

叫“交引”，相当于汇票。到清代，一个经营印染业的山西平遥商人雷履泰，在嘉庆初年（1796年左右）创立了著名的票号而使山西商人支配了全中国的金融事业。“票号”的前身是“镖局”，主要业务是汇兑。稍后于票号出现在清代的商业信用机构是“钱庄”，就是今天银行的前身。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在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南部的石仓一处山坳中发现了7000余件清代雍正以来的地契文书“石仓契约”，展示出在过去300年间，这个交通不便的山区乡村维持着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生活，建立石仓特有的金融借贷组织——定光会与五谷会，土地市场可以分为土地买卖市场和土地信贷市场。村民们用契约约束、规范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契约精神”。大家所共同遵守的秩序不是过去所理解的“礼法”，而是规则清晰的市场机制。

17~18世纪，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在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世界经济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以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并繁荣的时期，出现了像李贽、王夫之这样的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提出了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经济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思想。王夫之的“上之谋不如其自谋”的主张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说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使社会经济运作最大限度地摆脱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使经济得以按其发展的自身规律运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恩格斯论及东方社会时，皆以行政权力直接介入社会经济运行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显著特征，把它看作是东方社会发展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倡自由竞争学说，反对行政权力支配和介入经济运作，认为借助于

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对经济运作起调节作用，形成合理的经济秩序。这一学说为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实，在16~17世纪的中国，已有了此类思想观念的萌芽。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学说，就提倡功利主义，认为商品交易符合人追逐利益的本性。他十分鲜明地反对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经济运作，主张在自由竞争中“各遂千万人之欲”。但其论说由于片面极端而未免失之粗放，而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的经济思想更具有了近代思想的特征。他的论述，似更为扎实、绵密。

王夫之论及经济运作时极力主张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鲜明地提出了“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命题，并对此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说。他说：

人则未有不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藉其终不可给，抑必将改图而求所以生，其依恋先畴而不舍，则固无自毙之理矣。上唯无以夺其治生之力，宽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泽之富，有余力以营之，而无不可以养人。（《读通鉴论》卷十九）

这是一段极为深刻地论说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运作只能使民众“生计愈蹙”的文字。其立论的依据，就是“人则未有不谋其生者”，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求生存的自然本能，都有追求私人利益的动机，都有自谋其生的能力。如果把这一切都强行纳入政府计划，由政府来为民众谋生计，就会使人们“弛其自谋之心”，且“夺其治生之力”，势必导致普遍贫穷、甚至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状况。因此，王夫之坚决反对由政府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来支配人们的经济行为，主张让人们“自谋其生”，自由地发挥其“治生之力”，让每一个人都去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这样，以“天地之大、山泽之富”，皆“宽之于公”，又何必“忧人之无以自给也”。历代专制统治者和正统儒家都

以“养民”者自居，都说是他们养活了民众，是他们在致力于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而王夫之则指出，正是他们的僭妄，他们的行为剥夺了人民的“治生之力”，压抑了人民的“自谋之心”，使人民生计愈困。这是经济理论上的一大翻案。以现代市场经济的眼光看，任何一个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具有犹如最高级的电子计算机一般的计划和运作的功能，也无法预见和解决社会经济运作中出现的各种极为纷繁复杂的问题。谋生，毕竟是私人的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也只能是每一个追求其私人利益的个人；只有每一个人追求其合理的私人利益的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才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而每一个人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之欲求的活动，正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有力的杠杆。这一杠杆的巨大功能，是任何强大的政治权力都无法取代的。把每一个人“自谋其生”的权力还给个人，正是王夫之经济思想的近代诉求。

“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只是一个抽象的经济学原则，对此，王夫之还有许多具体的论述。他反复强调，社会经济生活自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应该让这种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只有“陋儒之妄”，才会迷信权力可以支配一切，可以对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生活任意发号施令，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

传统社会经济运作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行政权力来干预市场物价。而王夫之则认为，以行政权力来调节市场物价，只能作为凶荒之年救偏补弊的权宜之计，而不可作为通例；在正常情况下，行政权力干预远不如听任市场之自行调节。他说：

乃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余，则愈腾其贵；当其贱，不能使贵，上禁之勿贱，而怀金者不售，则愈益其贱；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读通鉴论》卷十六）

他看到了物价之贵贱取决于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互动关系，因

为大家都想贱买贵卖，商家彼此间的竞争又总是受买方市场制约，结果就使得物价总是趋于一个使买卖双方都能接受并由此受益的平均数。与此相反，以行政权力强制降低物价，则商家宁可使货物积压而不愿卖，商品流通减少则贵者愈贵；以行政权力强制提高物价，则消费者望而却步，导致商品多得卖不出去而贱者愈贱。因此，只有让市场自行调节，方能使物价常趋于平而避免出现贵者愈贵、贱者愈贱的局面。

行政权力不正当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活，还表现在官商勾结垄断市场物价上。譬如食盐，由官办盐业生产，然后批发给商人销售。于是奸商便和官府勾结起来“以限地界”，“地界限，则奸商可以惟意低昂，居盈待乏，而过索于民”。人民苦于盐贵，就从外地购进食盐，“官抑受商之饵，为之禁制”，这就造成了官商勾结共同垄断物价的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垄断，王夫之主张打破地界限制，“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至于价格，“一入商人之舟车，其之东之西，或贵或贱，可勿问也”。也就是说，让商人自由地去进行贸易，自行定价，官府不得干预。至于价格的高低，自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售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只要是自由的竞争，没有官商勾结垄断价格，物价自然会低廉，百姓亦可免受物价腾踊之苦。当然，对于商人来说，商品贸易的自由竞争中肯定有盈利者，有亏损者，有成功者，有失败者。王夫之认为，这是正常现象，自由竞争本来就是要较量智力的捷钝，“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这里所表达的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简直完全与近代的市场经济理论同调。在王夫之看来，政府愈无为，市场就愈有为；政府干预愈少，市场也就愈繁荣。这是老庄道家顺其自然的“无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用，同时又与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基本立论上具有一致性，是王夫之经济思想中值得珍视、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

而王夫之生于1619年，比西方称为现代市场经济之父的亚当·斯密（生于1723年）整整早100年以上。

由上可见，那种传统上一致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济思想的观点，尤其是断定中国没有产生过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思想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只是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偏重于社会伦理道德研究，性理之学过于发达，而对务实之学有所忽视，使市场经济的思想理论湮没在历史的云烟风尘中。再加上20世纪以来的文化转变，中国实行白话文后，熟悉和阅读文言文典籍的人越来越少，因而使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没有能够被很好地挖掘而广泛传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其实，汉语中的“经济”一词，就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是指“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完全脱离大的文化背景的经济学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土壤中。中国要找到一种真正能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经济学，就必须既要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的现代经济管理经验和经济理论，更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民生经营理念和思想，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因为产生在自己的大地母亲怀抱中的、自己祖先留下的精神财富更接地气，更服水土，和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更一脉相承。《中国人的经济学》，就是为了给当代的中华儿女提供一份历史证据，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更是一种提醒和警示。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为我们写下了内容丰厚的中国人的经济学。当代的中华儿女不但要创造出新的经济奇迹，在神州大地上谱写一部恢弘壮丽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光辉篇章，而且要写出一部站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当代的《中国经济学》。

是为序！

田学斌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富民为首：传统的民生理念 /1

一、亲民爱民	2
二、利民富民	7
三、为民予民	12
四、教民化民	20

第二章 管与放：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9

一、先秦儒、道、法三家对管制与放任的看法	31
二、《盐铁论》中的争辩	40
三、魏晋与隋唐期间的争论	43
四、王安石改革所引起的争论	48

第三章 损有余补不足：共同富裕的理想 /53

一、中国传统的均富理想	54
二、求富之道不外农商	58
三、薄赋敛、均田亩	62

四、齐从庶，抑兼并	65
-----------------	----

第四章 上谋不如自谋：市场经济的思想 /71

一、“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市场配置资源思想	72
二、“大贾富民，国之司命”的商品交换思想	79
三、“均天下”以厚民生的理想	88

第五章 薄赋富民：财税政策及其运用 /97

一、轻徭薄赋	98
二、榷酤之税	111
三、关市之征	115
四、清代的火耗与亏空	120

第六章 通货利商：货币信用的发展 /121

一、中国历史上的货币	124
二、纸币与信用工具	133
三、信用制度与借贷行为	137
四、货币信用与经济	142

第七章 民以食为天：以农立国的农本观 /147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148
二、北方农业的兴衰	167
三、南方农业的开发与技术进步	173

第八章 水利建设：民生之命脉 /183

一、古代水利的兴起及成就	184
二、陂水事业的经营	192
三、屯田经营与农田水利的发展	196

第九章 恒产与恒心：土地的分配与经营 /205

- 一、土地的开发 206
- 二、土地分配与经营 214
- 三、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 229

第十章 男耕女织：手工业型的家庭经济 /237

- 一、丝织业的起源和发展 239
- 二、麻织业的起源和发展 246
- 三、棉纺织业的起源和发展 249
- 四、中国农村的传统家庭副业 254

第十一章 物流交通：经济发展的血脉 /259

- 一、道路 260
- 二、人工河道 264
- 三、重要的交通工具 270
- 四、中国传统交通发展的特征 277

第十二章 互通有无：商品经济的发展 /281

- 一、“商”与“贾” 283
- 二、市场的出现 285
- 三、商人及商业活动 289
- 四、中国商业的发展 291

第十三章 城市：现代经济的象征 /303

- 一、城墙都市的特征 306
- 二、城市经济机能的强化 315
- 三、传统文化的据点——城市抑或乡村 320

第十四章 贸易与开放：通向富强之路 /325

一、世界性海上贸易圈的形成	327
二、市舶司制度的建立	336
三、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338
四、闭关主义下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	345

参考文献 /354

第一章

富民为首：传统的民生理念

所谓民生问题，即有关国民的生计与生活问题。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每一位治国理政者所无法回避的。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学者对民生问题的研究大多分散在各家典籍中。最系统、最全面、也最深刻地研究民生问题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是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论高文奇”的《管子》。可以说是一部体系恢宏的中国人的“经济学”。

Part One

所谓民生问题，即有关国民的生计与生活问题。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每一位治国理政者所无法回避的。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学者对民生问题的研究大多分散在各家典籍中。最系统、最全面，也最深刻地研究民生问题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是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论高文奇”的《管子》。可以说是一部体系恢宏的中国人的“经济学”。

一、亲民爱民

（一）顺乎民意

顺民利民，是管子的民本政策。国家之立，除主权、国土之外，主要之力量来源于人民。地广土沃而民众者国强，地广土沃而民寡者国弱。欲霸王天下，必先强其国；欲强其国，必先得民之力；欲得民之力，必当顺民、爱民、利民。因此，政府施政就应当采取以民为本的政策。西汉韩婴所著《韩诗外传卷第四》载：“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即安，辅之即强，非之即危，倍之即亡。’”意思是：“君王要重视（贵：重视，崇尚）什么？”管仲回答说：“要看重天。”桓公翘首仰望天空。管仲说：“我所说的天，不是指苍苍茫茫的天空。当君王的，要把老百姓当作天。给以百姓恩赐就能社会安定，帮助百姓就能国家富强；非难百姓天下就会危险，违背百姓国家就会灭亡。”管子强调：“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意思是：霸王之业的开始，就是以人民为根本，本治国家就稳固，本乱国家就危险。桓公想成为霸王，举大事，管仲教他必须从本事做起。所谓本事者：“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